

DOI:CNKI:65-1210/C.20111227.1911.006

【历史研究】

武汉地方文化对辛亥首义的影响^{*}

王春雷

(武汉商业服务学院 商业文化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56)

[摘要]该文以荆楚文化为背景,结合武汉码头文化、行帮文化、市民文化等地方文化,对辛亥首义进行文化层面的研究。荆楚文化培育了自强、开放、创新、隐忍精神;码头文化锻造了兼容并蓄的吸纳精神;行帮文化打造了团结、协调统一精神;市民文化形成了精明强干、机智灵活的市民特征。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地方特殊文化往往比地域背景文化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远。

[关键词]辛亥首义;地域背景文化;地方特殊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04(2012)01-0095-05

The Effect of Wuhan Local Culture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WANG Chun-lei

(Institute of Commercial Culture, Wuhan Commercial Service College, Wuhan 430056, Hubei,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undertakes a cultural study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by combining Jingchu culture with Wuhan dock culture, guild culture, Wuhan civilian culture. Jingchu culture fosters the spirit of self-reliance, openness, innovation, and forbearance; the dock culture forges the all-embracing spirit; guild culture gives birth to the spirit of solidarity and coordination; civilian culture cre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nniness, competence and smartness. In the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local culture often plays a more direct and important part than regional culture.

Key words: the Revolution of 1911; regional culture; local culture

目前,学界对辛亥首义的研究成果众多。一般多从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国际形势等方面进行研究,也有学者从文化角度进行探索,但多以对辛亥精神进行挖掘,或者对荆楚文化等大的文化背景进行剖析。辛亥首义的发生既有大的文化背景,但更脱离不开其发生地的特殊地方文化。辛亥首义发生的文化动因,既有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也有荆楚文化的地域背景文化,更有武汉地方码头文化、行帮文化、市民文化的直接影响。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除了受其背景文化的影响之外,地方特殊文

化的影响往往更为直接和深远。

一、荆楚文化对辛亥首义的影响

荆楚文化作为南方文化的主要代表,历史久远。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地广势强、国力雄盛。随着楚国疆域的拓展和民族融合,荆楚文化逐渐渗透到以长江为轴线的中国南方地区,而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长江沿岸城市——武汉,自然与楚国历史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荆楚文化其特质也正体现了南北文化的差异。多数学者从自然条件寻找解

* [收稿日期] 2011-11-06 [网络出版时间] 2011-12-27 19:11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武昌首义对汉商发展的影响研究”(2011jyte175);武汉商业服务学院 2011 年度规划科学研究项目“‘汉商’文化发展研究”(2011G032)。

[作者简介] 王春雷(1969-),男,河南南阳人,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商业文化研究所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

[网络出版地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65.1210.C.20111227.1911.006.html>.

释,清末民初学者刘师培所言,“楚国之壤北有江汉,南有潇湘,地为泽国”^[1]。“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1]梁启超曾从生存环境出发给予过较详细的分析,认为南方“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之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2]。从“不屑实际”、“不拘经验”出发,也就养成了南派学者“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的思想性格特点,这也就是“南学之精神”。

还有学者从楚国历史或文化史寻求荆楚文化精神特质的形成原因,将目光延伸到楚人的远祖祝融。《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均说楚人是祝融的后裔。《礼记·月令》云:“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在《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中,祝融又成了人与神兼备一身的高辛氏帝誉的火正。人神一体的始祖,使楚人窥见了人、神所属的两个世界,并因此而形成了与北方迥异的思维方式。颛顼“绝地通天”之后,北方人失去沟通天国鬼神的权力,而作为由最高统治者直接任命的“国家级”巫祝,其职责本就是为了沟通天地以协调民神关系,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视天国与人世为同一的世界,彼岸世界的鬼神与此岸世界的生民为生死相依的整体。由此决定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进而影响到人们的思维定势,决定了楚文化的基本特质。

楚人对于鬼神世界的态度是信奉但不臣服。楚人相信,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自己的力量。由此形成了自信、依靠自身力量的文化精神。《左传·桓公十一年》载,武王时,郢、随、绞、蓼等国相约伐楚,斗廉自请夜袭郢国,莫敖屈瑕要行卜,斗廉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于是夜袭郢国而获胜。楚人既有谄媚鬼神的痴心,也有筭路蓝缕的苦志,发扬蹈厉的豪气,更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充分自信。尤为重要的是,楚人有着尚真崇实的求索精神,刻意创新的睿智巧慧^[3]。这种自信、相信自己能力的精神,曾经演绎出了“楚人一炬”的历史壮举,更塑造了“敢把皇帝落下马”的辛亥精神。

自强进取是荆楚文化最基本的精神,主要表现为楚人“筭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的自强精神。周初楚君熊绎僻处荆山,“筭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

昭公十二年);两周之际,楚君“若敖、蚡冒筭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宣公十二年)。春秋中叶,称霸中原的楚庄王,经常向国人“训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这种“筭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精神成为荆楚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正是这种“筭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精神,使湖北志士发展军队士兵采用了非常严格而又灵活的方法——注意秘密行动,从物色对象、个别谈话、填写志愿书到组织审查批准,每一步都严肃认真。长期的艰苦细致基础工作,为辛亥首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荆楚文化浓厚的神秘性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衍变为荆楚文化的隐秘性。关于湖北人的群体性格,范楷曾经称赞道:“楚士多自潜修,耻尚夸耀,黯然日章,期合古道,声华标榜,未之前闻。”罗福惠认为,湖北士人“性格内向、耻于自我阐扬;不善结交、交流和授受”,“民俗士风多承袭传统的隐逸性格”^[4]。正是这种隐忍精神,使得湖北革命志士讲究策略,注意隐蔽精干,秘密行动,有利于革命的组织与发动,从而有利于推动革命的成功。正是这种不耻于张扬、埋头苦干、从基层工作做起的“鼯鼠精神”,才使湖北新军的“抬营主义”最终得以成功。

荆楚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荆楚地域是一个居民比较复杂的地区。东周时期,除楚族外,还有汉阳诸姬、群蛮、濮、巴、杨越等族属。此外,历史上还有数次北方的移民以及明清时“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由于民族文化和移民文化的差异,主体文化在发展中对这些存在差异的少数民族文化和移民文化,不断地加以涵化和兼容,由此形成了荆楚文化的兼容性。辛亥之前,在湖北军界秘密团体之组织,若雨后春笋之萌发,主要团体有黄汉光复会、自治团、武德自治社、振武学社等,这些小团体少至十人,大到几十数百不等。湖北革命组织广泛联合各种革命社团,扩大了革命阵营,增强了革命力量,在辛亥第二天,推举了黎元洪为起义统领。尽管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是无法做到这些的。

荆楚文化自主创新的进取精神。荆楚文化最深层次的价值观也具有多元的特点,但以道家的影响为深。商末楚君鬻熊具有较系统的道家思想。他在丹阳建立楚国,处荆楚一隅之地,在商朝压抑中生存和发展。后来虽投靠周人,但他们深深懂得,不依外力而“自长”,靠自己“积柔”、“积弱”而变

“刚”、“强”，这显示出楚人“以己为本位”的价值取向。西周中叶，楚君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以新得地分封诸子，均以“王”为名号。诸侯子弟称“王”有悖周朝礼法，熊渠则自有其理：“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东周时，楚武王创建中国第一县制以及令尹等一整套有别于中原的官制。从蛮夷的实际出发，自立自强，勇于创新，敢于另辟蹊径，创造性地建设楚国也就成了“我蛮夷也主义”^[5]的基本内涵，成为荆楚文化刚健有为、自强进取的一种基本精神。楚人敢于创新、敢为天下先的这种自主创新精神，在辛亥首义中再一次有了不俗的表现。首先在起义的区域选择上，敢于打破常规，避开广州等革命热点城市，选择中原腹地进行革命运作。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常规思维的挑战。在起义机会暴露，主要革命领导人不在起义现场的情况下，以中层官兵为组织者，勇敢地挑起了领导起义的重任，这又是一种敢为天下先，舍我其谁的革命豪情。这充分显示了荆楚文化中“我蛮夷也主义”精神，敢于革命，善于革命。

荆楚文化中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热情。荆楚人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置生命于不顾，积极变革、努力创新、敢为人先，充分发扬了自强进取的精神。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吴人破郢，申包胥自发入秦求救，倚宫墙哭泣7天7夜，直到秦出兵为止。吴人破郢都时，蒙谷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保存“鸡（离）次之典”。卖羊肉为生的屠羊说主动护卫昭王出逃。在却吴复楚过程中，人民自发起来反击吴军，“奋臂而为之斗”，“无将率（帅）以行列之，各致其死”（《淮南子·泰族》）。辛亥首义，“敢把皇帝拉下马”，结束了中国的封建统治，使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实现了中国近代政治文明的巨大转折；武汉商会、市民积极为革命军募捐，积极参与武汉保卫战。清军火烧汉口，武汉民众为共和付出了生命和财产的巨大代价，是荆楚赤子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也是长期受荆楚文化浸润的必然结果。

荆楚文化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长期的自然生存环境的不稳定性造就了楚文化的短视性。江汉平原是楚文化的发祥中心，有相对优越的农耕条件，但也洪灾频发。楚人长期生存于“洪进人退，洪退人进”的怪圈中，楚人长期处于难舍沃土又不得不屈从其“淫威”的矛盾心态。对自然灾害的不可抗拒和不可预测，使得人们养成了逃避和侥幸的行

为准则，并逐渐渗透到楚文化中，助长了注重既得利益的短视观。在辛亥汉口刘家庙之役中，面对暂时的军事胜利，起义军放松了警惕，导致战斗的失利；在湖北军政府中，革命党人无原则地退让，使旧立宪派人处于有利地位等等，这里面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不足等原因，但也绝对不能排除革命者受荆楚文化“短视性”的影响。

二、码头文化对辛亥首义的影响

武汉自东汉年间就已形成市场，三国时期武汉是“国”与“国”之间“互市”的口岸。到唐、宋时期，武汉成为内省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商品转运地，并承担转输“漕粮”、“官盐”之枢纽。近代汉口被迫成为通商口岸，因其“内输外纳”，曾有“东方芝加哥”称号。便利的水上交通打造出武汉地区独具特色的“码头文化”，主要特点是文化的综合性。因为武汉历来是国内商品集散地，近代又加进了对外贸易的口岸性质。万商云集武汉，一方面带来各种商品，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异域文化。历史上武汉人口多为周边以及外省人“移民”，这就决定了武汉地方文化具有兼容并蓄的吸纳性，能容纳并不断吸收异域文化。正是因为不同文化交集、碰撞、综合、融合，逐步形成武汉所特有的“综合型”的地方文化。

“码头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性。长期的码头贸易，对货物的大进大出，这种生产方式逐步形成特殊的思维方式，即对一切开放，将一切纳入，倾向于大进大出。正所谓“总天下之佳货，纳万商之奇思，营全球之精品”。另外，武汉人喜欢“扎堆”，这也与武汉的“口岸”基因有密切关联，同时也与商人喜欢结帮经营、同行之间喜欢互抢生意、顾客喜欢“跟风”凑热闹、市民喜欢看稀奇等武汉市民文化有关。“码头文化”的缺点是短视性，缺乏长久性，很难形成自己的风格。武汉商业历史悠长，但缺乏有较大影响力的商人和商号，这也与武汉的转口贸易有关，多数商品仅是转口，缺乏长久性，逐渐形成了人们处理问题的暂时性做事风格和思维方式。人们将武汉仅当作一个“口岸”而非“故土”，存在一种随着人群流动而流动、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易变性，其文化的主体性不足，文化的自我认同不稳定，易受其他文化影响或支配。

武汉的“码头文化”在辛亥首义中，也有具体的反映。其开放性主要表现在商会和市民在对辛亥首义的积极反应上。码头文化的短视性在辛亥首

义南北对峙中有所表现。1911年12月中旬南北和谈开始以后,武汉工商界逐渐转向妥协。工商界首先关心的是,如何弥补以前的损失和获得新的利益。为此蔡辅卿、刘歆生、宋炜臣等曾面见黎元洪,要求政府重建汉口市区,筹划经费。1912年1月25日,汉口商会举行会议,讨论重建汉口市面办法,宋炜臣提出,“汉口已惨遭兵燹,应行重建,然财政颇为困难。莫如请黎副总统转请大总统与清政府开正式谈判,以其内帑赔偿汉口之损失,方为上策”^[6]。1月27日,汉口商会又致电袁世凯操纵的清内阁,表示“深望和议早成,共谋善后,以图振新”,“转恳两方政府,将汉口、汉阳……划作中立地点,不再开战……以苏商困而惠民生”^[7]。上层工商业人士最终走上妥协求和之路,显示了武汉“码头文化”的短视性。

三、行帮文化对辛亥首义的影响

在“码头文化”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武汉所特有的“行帮文化”。“行帮文化”是在千千万万来汉商人按地域、亲缘、行业分类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组织化文化,具有一定的排他性。行帮文化以发达的帮会组织为土壤,它既具有行业性,也带地域性。在武汉历史上“无商不成帮”。这种“行帮文化”对武汉的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有利于深化经营分工,客观上起到了推动地域化专业分类市场的形成;但行帮文化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和排外性,不利于商业组织或资源的优化整合。行帮文化的优点是有助于团结互助,便于协调统一行动。

辛亥首义中,商会充分发挥其组织性作用,为革命军捐款、募集革命经费、组织民团参与汉口保卫战等。武昌首义之后,武汉工商界迅速转向支持革命。武昌首义的第三天(即1911年10月12日),武昌商界百余人在武昌医馆开会,邀请起义军政府派代表参加。继而部分武昌商人担任了军政府政事部参议等职,当天吕逵先发起成立武昌地方保安社,典商张良卿捐助万金为开办经费,社员约千人。军政府为巩固革命成果,扩军亟须军费,武昌商会垫借5万元,分配作临时膳食费。汉口商界的革命热情更高。首义当晚,汉口商会会长蔡辅卿召集会议讨论,与会者均表示愿服从革命。汉口各

团联合会员千余人开会筹议,决定了“保卫地方,协助民军”的行动方针。汉口军政分府成立后,商会把各地段的保安会扩大为半武装的商团,起义军拨给枪支,由商团担任巡缉匪徒,保卫全市治安的任务。商界亦有不少人参加军政分府工作^[7]。

工商界最主要的贡献是为革命政权筹款。武昌首义时部队膳食支出由武昌商会垫付5万元外;汉口军政分府成立卫队,缺乏伙食给养,汉口商会“概允送十万元以济军需”;军政分府又发纸币50万元以供周转,由汉口商会指令各钱庄票号代为兑换。汉口捐款办事处募得7万元,武昌亦募得4.5万元。湖北军政府还计划以刘歆生、韦应南的私有土地为抵押,向湖北官钱局借款300万两,得到刘、韦两人的支持。当一名日本记者到武昌访问黎元洪,问及军需从何解决时,黎元洪信心十足地说,“现在商人之捐助军费如此慷慨,吾等绝不忧军费之缺矣”^①。据相关统计,辛亥革命头两个月内,武汉工商界资助革命军费用达100多万元。汉口失陷,战事转到汉阳之后,万昭度等人组织汉阳商团“维持秩序”,“严禁出入,防杜汉奸”,并将汉阳县积存谷米3000多担“援救民军”,“押运粮食不遗余力”^②。武汉工商界对辛亥首义从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除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之外,也与商界的行帮文化有必然的联系。行帮强大的组织能力,便于商界集中人力、物力统一行动,增强了对革命军的支持力度。

四、市民文化对辛亥首义的影响

武汉独特的地域还孕育了“市民文化”。由于武汉作为码头,商圈大、信息灵、商品多、竞争激烈,使得讨价还价、货比三家成为武汉市民文化的又一特色。由此形成精明能干、信息灵通、随行就市、讨价还价、斤斤计较、小富即安的武汉市民文化。武汉因其交通条件的便利性和商品集散地的得天独厚优势,经商条件优越,各种思潮汇集交融,政治敏锐性较高,对革命有一定的倾向性。

辛亥首义,武汉的市民有很高的参与度,前期的民心大多倾向于革命者,这都与武汉市民文化中的精明、信息灵通、便于接受全国各地信息相关。受武汉的舆论宣传、报纸等新闻媒体的影响,武汉

① 参见《辛亥革命参考资料》,第5册,第177页。

② 湖北辛亥革命实录馆档案资料“汉阳商团大概事”。

市民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被焕发出来,表现出了很高的革命积极性。在阳夏战役中,主动为前线士兵送粮送弹药,还有很多人参加到革命阵营中来。在首义之后长达一个多月的阳夏保卫战中,武汉民众踊跃担任运输、救护,甚至还直接参加了战斗。民军在刘家庙、三道桥一带作战时,武汉市民星夜赶蒸馒头、烧开水;全市商铺,每日准备数百担馒头、酒肉,由商民组织慰劳队送上前线。起义军急需弹药和夫役,各团乃率会员、夫役,从汉阳枪炮厂将炮弹、枪弹速运火线;并在汉口歆生路(即今江汉路)的余庆里、长源里等处设立了军人招待所,接待参战官兵;又在如寿里搭盖大席棚,架起大锅大灶,各团联合会送米百余石,在这里为起义部队做饭菜。当第一批援鄂湘军来汉口助战,汉口公善保安会会员为之担任向导。汉口作战期间,刘子敬、王明文、崔世瑞、陈凤池、周承训、刘白贞等人,成立红十字会,联系仁济医院、中西医院,专门救治伤兵,掩埋牺牲者。半个多月中收治伤兵1300多人,药品均由商民出钱资助。堤口下段商团保安会最为英勇,有“18人负枪助战,20人搬运炮弹,18人捐纳财粮”^①。武汉市民能够全力协助民军作战,形式多样、机动灵活,充分显示了武汉市民精明强干、信息灵通、机智灵活的市民文化底蕴。在大是大非面前,有一定的革命觉悟,这也与武汉地区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各种思潮交汇,市民有一定的思想基础有关。

五、结 语

武汉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原因,以前研究者多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角度进行研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文化观念对辛亥革命的影响,也有少量从区域文化特征加以深刻论述的研究成果。章开沅提出了“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强调不仅要注意人们历史活动背后的经济动因,也要注意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社会诸要素,以至某些自然条件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即历史传统、社会结构、文化素质以至民族心理、地理环境等许多方面的影响。”^[8]研究辛亥革命的动因,文化动因是一个重要因素,而文化动因中,区域文化研究是

一个独特的角度。对辛亥革命发生地的文化动因进行研究,仅仅是对区域文化的代表——荆楚文化进行研究还远远不够。作为南方文化主要代表的荆楚文化有很广的覆盖区域,而直接或间接参与到辛亥首义中的人物,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人,除了受荆楚文化的影响之外,还与他们生活的地域、参与的社会活动、所处的社会团体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其特有的文化心理。荆楚文化具有一定的覆盖度和归纳度,只靠单一的荆楚文化来进行辛亥首义的文化动因研究显然过于单薄。本文通过对辛亥首义之区武汉的背景文化荆楚文化进行研究之外,还对辛亥首义参与群体的具体文化类型进行研究。对武汉地区的码头文化、商人群体的商会文化、市民个体的市民文化进行研究,对参与或间接参与的众生态的不同文化背景进行研究,以全篇幅地展现辛亥首义时期不同参与者的文化心理及其对辛亥首义的影响。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历史人物是具体的人,其背景文化固然重要,但其具体文化往往更为直接。甚至某些情况下是具体文化直接导致某种重大历史行为的发生。本文只是进行了探索式的研究,文章粗鄙,仅为抛砖之作。

〔参 考 文 献〕

- [1] 刘师培. 南北学派不同论[M]//刘申叔遗书:上.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549—560.
- [2] 黄中模. 屈原问题论争史稿[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236—237.
- [3] 陈琳. 辨本:楚文化之质[J]. 船山学刊,2004,(2).
- [4] 罗福惠. 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M].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
- [5] 涂又光. 楚国哲学史[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73.
- [6] 中科院历研所. 辛亥革命资料[M]. 北京:中华书局,1961:612.
- [7] 罗福惠. 武汉工商界与辛亥革命[J]. 湖北文史,2010,(2).
- [8] 严昌洪,马敏. 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J]. 历史研究,2000,(3).

(责任编辑:吴凌霄)

^① 参见《堤口下段商团保安会事实》。